

不挂牌是“另类的威仪”

一把手,别把自己办公室搞得太神秘 12月14日 重庆晨报 王方杰

12月12日,记者对河南洛阳市多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暗访。发现不少单位不仅没有在机关办公区域分布图上标示局长室,房门上也没有标注。有工作人员针对局长或副局长办公室未挂牌的现象向记者揭秘:“我们都知道在哪儿,不用挂牌子。”

(12月13日《东方今报》)

重庆晨报一评

很多单位的“一把手”都不愿意让太多人知道自己的办公室在哪儿,也不情愿在自己办公室门口贴上身份职务标签。不仅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包括企事业单位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是低调吗?不是。

一把手的办公室不好找,一把手自然也不好找。普通百姓、一般员工要找领导,要登记,要预约,层层关卡,最终还不一定见得到领导。如果找领导是“麻烦事”,那就更困难,单位首先会从“保护领导”的角度,按照党政机关惯用的“层级理论”,从门卫到办公室,从勤务人员到领导秘书,一级一级汇报,最终大多以“领导正在忙”“领导已出差”“领导刚开会”来搪塞。

一把手的办公室为何秘而不宣,不愿示之于公众?这里面还真有很多道道,既有不愿示人之处,也有不能示人、不敢示人之处。这里所说的“示人”,当然是指平民百姓,而不是一把手们的“内部人”。

不愿将自己办公室示人的一把手,与个人风格有关,一般不希望有人破坏自己清静的办公环境,打扰自己工作,不喜欢越级反映情况,对来举报、来上访的,就更不欢迎。

不能将自己办公室示人的一把手,就有多种情况,比如自己的办公面积大大超标,太过奢华,怕老百姓来看了影响不好。所以他们的办公室只适合接待同僚或上级,不适合接待普通群众。

不敢将自己办公室示人的一把手,是不是因为办公室里藏有秘密?或蝇营狗苟,或藏污纳垢,一旦被外人知道,不会掉脑袋,也会丢官帽,所以对一般群众的到访更是严防死守。

很多一把手把办公室看成了自己的个人隐私,私人领地,不开门迎客,拒群众于千里之外。一把手一旦关闭了自己的办公室,就是关闭了民意畅通的大门,你所获得的材料很可能是经过下级编辑整理粉饰加工甚至阳奉阴违胡编乱造的“二手货”,很可能是形式主义假话空话大

话套话连篇的会议材料,即便你是一个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清官”,也难免不受蒙蔽。

现代快报再评

当所有办公室都挂牌独只有把手、二把手不挂时,那么,真要找他们办事、谈工作,直接找那些不挂牌的办公室即可,前提是他们要在办公室。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此地无银”呢?我看是为了展示“另类的威仪”,通过一种刻意的“低调”,以一种强烈符号化的仪式感,拉开普通干部、群众与自己的差距。“另类的威仪”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以古罗马为例,共和时期的政治家要拉选票讨好民众,屋大维开创帝国时代后,刚开始还与群众打成一片,显示出“开明君主”的模样。往后权力越集中,帝国的皇帝们越是觉得有必要与民众保持距离,于是建造辉煌的宫殿,将自己隐身在庭院之中,通过幕僚、亲信发号施令,远比按规章制度、民主原则更能获得权力带来的快感。

人治大于法治 “家法”就会横行

一场攸关交通安全的坑爹故事,暴露了不羁权力的种种丑态。太原市公安局长李亚力的倒掉,让一些地方“警察家仆化”的现象,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社会考问和反思。

(12月13日新华社)

“家法”代国法,公仆难免成家仆 12月14日 重庆时报时言平

重庆时报一评

说到底,当地警察系统集体庇护违法乱纪的公安局长之子,乃因公器通过集权转换成为了私器。“老子这是执行家法”,由李公子的狂言不难看出,当地执法者俨然被视为李家的家仆。

面对执法者异化成权力者家仆的怪相,应当引起整个社会的警觉。某些官员一手遮天,资源被垄断和操控,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其营造的政治生态难免变得不相信法治,而迷信与依赖威权。有些官员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甚至主宰他人的前程命运,盖因官员意志太过强大,“家法”取代了国法。

从不少问题官员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类似以权代法现象的存在。在个人意志的凌驾下,很容易脱离法治轨道自成王国。而在强势的利益共同体面前,那些坚守良知与正义的人们,很容易成为异端,遭到“家法”的处置和群体的排斥甚至仇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威权笼罩下,正义和良知往往被放弃和背叛,更多的人往往会选择苟且,甚至成为帮凶。

李亚力不是唯一以“家法”代替国法的权力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要消除以权代法的环境土壤,得循着十八大指出的道路前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而放置在李亚力案上去解读,更是意味深长,给我们的警示是:唯有法治,才能避免公权私有化,才能避免公仆“家仆化”。

现代快报再评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根本 在这篇评论发表的同一天,《南方周末》刊登《重庆警界低调纠偏告别黑打》,南都周刊发表石扉客长篇述评《王立军是如何炼成的:打黑、治警和包装》,还原了一个将“国法”当成“家法”,将“公仆”变成“家奴”的典型样本。所以,这篇拿太原市公安局长李亚力来说事的评论发在重庆媒体上,显然意有所指。

在现行宪法3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从没有宪法到有了宪法是一大进步,有了宪法后如果不能真正尊重宪法、实施宪法,那么,这张“写着人民权利纸”仍然有可能是一纸空文。无数惨痛教训说明,当宪法受到漠视、践踏,当人治大于法治,“国法”就很容易沦为个别人的“家法”。

那就改为“沧州好人堂”吧

“名人堂”理应拒绝魏忠贤 12月14日 北京晨报 里工

北京晨报一评

沧州还是很有“气节”的,毕竟眼下是经济利益高于一切,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少历史名人由此被“擦荒”多年的故纸堆里请出来,为家乡再做贡献,有的地方历史贫瘠少有大家,则或者与其他地方争抢,哪怕这名人路过一次也算第二故乡;或者不辨忠奸,只要是个名人就拿来古为今用,随后大兴土木制造虚假景观;更有甚者,连莫须有的孙悟空、西门庆等神话人物和小说人物也一并抬将出来,弄假成真,贻笑大方。在此情势下,“沧州名人堂”拒绝明代宦官魏忠贤,清代宦官李莲英等虽为众人所熟知,但不符合先贤的筛选条件,因此未能进入沧州名人堂。

当然,不管流芳百世,抑或遗臭万年,李莲英、魏忠贤们毕竟赫赫有名

名,其名气比不少列入名人堂的“正面历史人物”大得多。

所谓历史,正是由每个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也不能对魏忠贤这类的“名人”视而不见。不过,如果在名人堂里,让魏忠贤和春秋名医扁鹊、元代戏剧家马致远、清代文学家纪晓岚、名臣张之洞比肩,也实在贻笑大方。其实,我们或者拒绝,或者可以在名人堂里设置个展区,把上述历史上的反面教材放里面,既尊重了历史,又符合沧州名人堂的“正面宣传”的设想,还能警醒后人。而无论如何,我们赞赏沧州名人堂的做法,用句时髦的话说,这种拒绝“令人不齿的反面角色”的做法,传递着一种“正能量”。

现代快报再评

“洪洞县里无好人”,那是京剧

《苏三起解》里的唱词;“沧州城里无坏人”,那是“沧州名人堂”要传达的意念。

文化部2010年曾发文叫停“反面名人故里”,针对的是以传承名人为核心的争夺经济资源的乱象。“沧州名人堂”表面上看符合文化部的精神,实则矫枉过正。

既然是一个以地方名称命名的“名人堂”,那么,就理应具有尊重历史、传承文化的公共性,就理应客观、全面,还原真实的人文面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有正也有反,有阳也有阴,有进步也有落后,有辉煌也有不堪,一味将反面人物逐出公共记忆的殿堂,非但不能表明其“气节”,反而暴露出不敢正视历史的怯懦。折衷的做法,那就改为“沧州好人堂”吧,别让人误以为沧州这地界连历史上的坏人坏事都不敢承认。

“学历查三代”也许只是一种偏好

高学历泡沫经不起“查三代” 12月14日 人民日报 边晓璇

人民日报一评

对于就业市场来说,“学历查三代”的做法确有歧视之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暴露出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在生活中,常听到“一流的本科,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之类的说法。

高学历为何难以获得相匹配的认可?很多人将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归咎于扩招。扩招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脚步理应放缓,而培养制度层面的改善更为紧迫。作为硕博培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导师制,曾被誉为“牛津皇冠上的宝石”,但我国的硕博培养机制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导师考核以课题、经费、论文等为硬指标,学生培养质量并不与之挂钩,以至于导师忙着跑课题,“有水平者没时间,有时间者水平又不够”。在“放羊式”培养下,许多人上十几门课程、交一份毕业论文就应付完硕博学业,在能力上并无多大提升。

然而,硕博培养中的水分却浇不熄某些高校对申请博士点的狂热。不少高校增设博士点只为应付考核指标,或是通过扩大招生规模增加收入,以至于监督体制的建设速度远远赶不上。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中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如此批量生产、浮躁培养已离培养研究型人才的核心目的相去甚远,长此以往,贬值的不只是高学历,更是高层次高等教育的公信力。“学历查三代”也是市场对盲目追逐高学历的倾向发出警示信号。不少学子对考研、考博趋之若鹜,却并未将学历的提升与自身成长完善相结合。某些地方院校考研率极高,很多学生从大一大二就开始准备考研,时间都花在了泡自习室上,被戏称为“考研基地”。借读研“镀金”的愿望可以理解,但若仅为“换个标签”、混个学历,或再度陷入“死读书、读死书”的应试泥淖,即便有了高学历,“查三代”也会无情地将其“打回原形”。

现代快报再评

“高学历泡沫”是真,“硕士、博士的培养水分多”也是真,但用人单位“学历查三代”,未必就是批判现行硕、博教育机制的最佳例证。照这个逻辑渐次递进,如果用人单位偏向专科、职业学校,就是对本科教育的否定;如果只招高中、初中毕业生,那就是对高等教育的所有阶段的全面否定。用人单位重视求职者的初始学历,也许是结合了需求实际,其工作岗位性质更看重本科阶段的教育经历,与硕、博教育背景没有多少关系;还有一种“也许”,就是纯粹的偏好和习惯。哈佛大学曾流传一个段子,说校园发生一起车祸,教授们纷纷打听受害者是博士还是本科生,如果是博士,大家只是表示悲伤,因为失去的是一位可能的同行与同事;如果是一位本科生,那么,除了悲伤还有几分惋惜,因为失去的有可能是一位总统,或者一位经济界的巨擘。